

李國芳，《初進大城市：中共在石家莊建政
與管理的嘗試(1947-1949)》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383頁。

夏松濤*

著名學者楊奎松曾說：「好的論文關鍵要有思想，要能發現新的問題，能給人以啓發，讓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初看李國芳博士的新著《初進大城市：中共在石家莊建政與管理的嘗試(1947-1949)》，我就有耳目一新的感覺。該書挖掘新史料，發現新問題，採用新視角，得出新觀點，對被朱德譽為「奪取大城市之創例」的石家莊市進行了深刻的解讀。石家莊市作為中共首次確立「長期建設」方針的城市，中共關於如何建立和鞏固城市政權、如何管理和改造城市的一系列設想，第一次在這裏實施，所以它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中共建國初期所遭遇到的種種複雜的問題及其解決辦法，非常具有代表性。透過這個典型城市，作者闡釋了共產黨從革命到執政轉變的深刻內涵，讓讀者得到很大啓發。

對資料的深層次挖掘，是該書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梁啓超曰：「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以前的相關研究，存在一個明顯的缺陷是使用檔案資料偏少。面對這種現狀，李國芳大量搜集和積累第一手檔案資料，故該書檔案資料比重之高，遠過於其他相關著作，為該書的精湛立論奠定了堅實可靠的基礎。在論述共產黨幹部入城時的生活實態和思想矛盾時，李國芳運用了幾則有意思的史料：部份農村幹部進城後，見到衣衫襤

* 廣東湛江師範學院思政部講師

樓者就倍感親近，對衣著整潔者則側目而視；驚訝於電燈為什麼會亮，不明白「把馬路修那麼寬，那麼平有何用」。1947年底，一些幹部看到商戶和居民家中有拖把，誤以為那是填充土炮所用之具，命令對方交出大炮；有的幹部去看電影，搶著坐到第一排，以後逢人就講：「進了城，千萬別看電影，晃眼，不能看」；稅務所幾個幹部1948年除夕大掃除，爭著用濕布擦拭電燈泡，結果不幸觸電身亡。另外，共產黨進城後的生活水準不但沒有提高，反而不如農村的生活，從諸多材料可以得到佐證，如王文克回憶道：「糧、油、炭什麼都靠花錢買，比在農村時還苦，天天小米飯，再有點兒白菜、鹹菜。一碗麵條，放點油鹽就是好病號飯了。有些在農村根據地的同志，想進石家莊改善生活，買兩個缸爐燒餅，那是最好的食品了。」這些史料凸顯城鄉之間的隔閡，共產黨對城市生活的陌生，以及初進大城市的困窘，突出了本書的主題。

運用資料時，李國芳注重史料的鑒別與比較，儘量減少個人的偏見或意識形態，以求得到一種對歷史的準確重構。從大量檔案發現，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共產黨一進城，就受到民眾的熱烈歡迎，事實上石家莊各階層對共產黨有各種疑慮：在工商業者心中，不少人認為共產黨保護工商業口號只是手段，是暫時的，共產黨終於要「共產」，因而大吃大喝，不敢開門做買賣，或分散擺攤，低價處理機器設備。在職員心中，不少人認為蔣介石是「好人」，中共「到處破壞」、「鬥爭」、「非刑殺人」，「存在著很大的恐怖」。在教師心中，一方面不滿國民黨的貪污腐化，另一方面又聽信國民黨的宣傳，不少人認為中共實行的「三十六殺」、「八大刑」，會殺死中學生，燒死大學生，擔心中共「排斥知識分子，殺知識分子」，思想不自由，不准隨便指責政府，不比國民黨，有不滿時還可發牢騷。在學生方面，受老師的影響，市立聯中男學生一律剃成光頭，鑲金牙的將金牙拔下來；女學生怕被抓去入婦聯會（被認為是「慰勞隊」，要給八路軍當老婆），或不敢出門，或及早結婚。在產業工人心中，不少人「對於日本人的一切印象甚深，對於共產黨則不甚瞭解」，由於他們容易接近新鮮事物，在中共進入石家莊初期即「到處活躍」。在貧民心中，共產

黨「對窮人好」等原來比較模糊的認識陡然清晰起來，入城之初，有的貧民搶到的煤足夠燒二至三個月，差不多每家貧民都有桌子和凳子。然而共產黨進駐石家莊約一年多的時間內，市民還是「對黨很生疏，或者把黨、政府、八路軍混為一談」，認為「共產黨就是八路軍，八路軍也就是共產黨」、「參加共產黨非參加軍隊不可」、「工作人員也就是共產黨」、「凡是脫離生產的幹部都是共產黨」。從這些塵封已久的檔案中，可以看出共產黨從革命到執政初期任務的艱巨性。

在對史料細心研讀後，李國芳清楚認識到石家莊作為中共從農村到城市的重要起點，研究的空間很大。通過中共幹部進入石家莊市從不適應到適應的一連串挫折和轉變，可以提出一系列有價值的問題：共產黨幹部在進入石家莊市時，沒有系統的城市工作經驗和相關理論總結，究竟應該怎樣完成城市革命的任務呢？進入石家莊後一直處於秘密狀態的中共黨組織，是否需要公開及如何公開呢？共產黨在石家莊城市中沒有深厚的群眾基礎，如何把混在勞動人民中的不純潔分子清理出來，從而鞏固城市統治呢？如何保障石家莊城市物價不再惡性攀升，如何按照共產黨人強烈的意識形態改造原有的經濟格局，以及如何通過各種途徑保障城市的財政收入與支出？共產黨的社會管理經驗缺乏，在很大程度染上了農村的特點和革命的色彩，如何管理城市中的治安、戶籍、賭博、色情、乞丐以及學校教育等社會問題？在這些問題意識下，該書分為五章，第一章探討建立新秩序，第二章闡明建政與建黨，第三章論述肅清「不純潔分子」，第四章研究城市經濟管理，第五章詮釋城市社會管理。這五章脈絡鮮明，結構嚴謹，邏輯嚴密，全面解讀了中共在石家莊建政與管理的歷史實踐。

在強烈的問題意識下，李國芳按照史學規範進行的客觀研究，勾勒了群眾運動的得失、政權體制的改革、民眾參政機構的流變、整肅異己分子、建立財經秩序、維持城市治安等發展過程和演變軌跡，這就迥異於傳統的中共黨史著作，還原了真實的歷史圖景，展示了歷史發展的多樣性。以前的相關研究，沿襲著黨派史觀範式，存在著較為單一的「政策——效果」模式，忽略了鮮活的

歷史演進過程，忽略了城市社會與革命政策的關係，忽略了共產黨遇到的困難、障礙和糾葛，從而將中共革命神話化，遮蔽中共革命的複雜性，李著在這方面有較大的突破。值得一提的是，李國芳注意從心理學層面對歷史人物的心態進行描述。如共產黨進城後，原來擁有較高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有產者惶惶不可終日，他們甚至普遍產生了「從前恨自己不富，現在恨自己不窮」的心理。私營工商業者更為恐怖，他們關廠關店，祕密大吃大喝。又如鐵路局的原失業工人和老年退休工人受「不報到怕沒有飯吃」心理影響，也紛紛加入工會，三天之內會員就達到九千多人，而實際上該局在職工人僅有五千人。再如，對於「蔣黨人員」的自動登記，石家莊一般市民根據以往的親身經歷，對承認國民黨員身分後是否可能得到新政府寬大處理，存在相當嚴重的懷疑、恐懼心理。他們認為，「過去國民黨捉住共產黨或與共產黨沾邊的就殺了，共產黨來了一定殺國民黨。」故一些市民在登記之前特別恐慌，每日哭哭啼啼，不吃飯，想上吊。像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通過鮮活的資料刻畫民眾的心理，說明了共產黨執政初期民眾心理的波動，讓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城市史研究容易空間宏大而湮沒個性，李國芳則注重與相關研究成果進行學術對話，透過石家莊市的特點，將其置於建國前激烈紛繁的時代背景中，窺視中共從農村到城市、從在野到執政、從革命到建設等一系列重大轉折的過程。本書有三個方面的分析頗為突出：第一，以前的研究未能反映出石家莊市建政所處的時空環境，即石家莊的接管實踐在全國城市接管中所處的地位，以及石家莊市在中共重心從農村向城市轉移過程中的重要地位。李國芳的研究表明，石家莊是中共在城市建政與管理的重要樣本和起點，中央通過不斷總結石家莊城市工作的經驗與教訓，將在石家莊取得初步城市經驗和認識的幹部不斷外調，藉以推廣到華北乃至全黨，從而為其他新佔領城市提供借鑒和參考。第二，以往關於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形成的研究，雖然成果甚多，卻多半失之於籠統，缺少個案剖析和具體案例的深入分析。李國芳通過分析大量檔案文獻資料，以全國首例城市人民代表會議——石家莊市第一次人民代表會議為例，論

述了中共進城初期在石家莊創建城市民眾參政機構的探索經過。1949年4月，石家莊市以階級分析為基礎，採用民主程序，直接選舉產生該市第一次人民代表會議的代表。1949年7至8月，在全國城市中首次以「人民代表會議」的名義，召開會議，選舉新的政府委員會。由於中共認為類似石家莊市的經驗和做法在當時條件下無法實施，加以受史達林關於通過普選取得新政權合法性建議的影響，所以石家莊市的選舉經驗沒有推廣，石家莊第一次人民代表會議只能屬於「各界代表會議」的範疇。第三，以前的研究承載了太多的政治宣傳功能，李國芳從原始的史料中對共產黨如何完成城市革命任務進行了總結，他說：「逐漸按照城市的現狀和需要調整和修正自己的策略和政策，正是中共能夠不斷贏得城市民心、能夠在城市站穩腳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此基礎上，作者深刻地闡釋革命黨與執政黨的角色取向：「身為革命黨，面對瞬息萬變的形勢，它需要權力的高度和集中和統一，需要一攬子式的簡政機關，需要簡便靈活的政策和運轉機制，需要以革命理想和信念支撐其艱苦的生活和鬥爭。而作為執政黨，它更需要權責分明的政府體制，需要科層制的官僚機器，需要相對固化而完善的法律，以及在此框架下程序化的『懲惡揚善』的監督制度，需要各得其所的合理分配制度。」這段話客觀地描述了政黨執政理念轉變的脈絡軌跡，凝練地總結了共產黨在石家莊城市建政和管理的經驗，發人深省。

在總結經驗的同時，李國芳還對共產黨的城市管理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正如楊奎松教授所言：「今天研究建國史之類的歷史，絕不僅僅是為了將事情的來龍去脈梳理清楚，必須要有一種批判性的反思。」在論述中共對城市功能認知的問題上，李國芳認為：中共對石家莊城市的定位是由為反動統治服務的商業城市，變成人民的生產城市，這種定位使城市蛻變為功能基本相同的工業生產基地，極大地影響了建國後的城市化速度。正是由於這種功能定位，城市中提供「陽春白雪」式生活休閒方式的工商業，如造香、金店、銀樓、帽業、乾鮮、茶樓、鐘錶、酒業、綢緞等行業逐漸轉行或改組，城市工商業經濟發展失去活力。在論述共產黨發動群眾運動對城市進行管理時，李國芳注意到，「就

連原本為維護城市秩序而組織的貧民會糾察隊和各行業工會的糾察隊，也日益演變為貧民會和行業工會『抓人』、『查封』的工具，抓人、審訊、處理甚至完全不經市、區政權或公安局。並且，在供給制度未能解決時，糾察隊員們每天集中起來吃大鍋飯，大肆浪費。」他理性地認識到：「群眾運動一旦啟動，和平、理性、寬容等社會常態就會很快被打破，暴力、感性、促狹等傾向難免到處蔓延。」在梳理中共在城市建政和管理中遇到的種種困難、疑惑和摩擦時，李國芳深刻地闡釋了共產黨從革命向執政的艱難轉變的歷史緣由，那就是：一方面，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不斷革命論者」，在「反帝、反封建、反國民黨」的民主革命結束後，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的目標依然要求它繼續革命，直到中國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為止。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徹底革命論者」和社會革命論者，奪取全國政權不但開啓了社會革命和社會改造的序幕，而且為社會革命和社會改造提供強有力的體制保障。這些結論不僅有學術價值，還有現實意義，極大地提升了本書的理論水準。

總之，該書用歷史學的研究方法，遵循歷史學的研究規範，彌補以往研究的缺陷，是一部建國史研究的佳作。儘管作者在石家莊城市文化管理，如對報刊、書店、出版社、戲院、民間曲藝、群眾文化等方面尚需深入論證，但作者注重一手檔案資料的利用，設身處地體會歷史場景，避免先入為主的判斷，從而最大限度地還原了歷史的真實。本書最後談到農民的鐵輪大車屢屢進入市區，威脅或軋壞本來就不多的柏油路面，市政府不得不先後六次發出布告，三令五申禁止鐵輪入市，這是對國民素質的深思，讓人再一次感悟到中共初進大城市的艱難處境，為讀者留下了深邃的思考空間。